

#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史料组

## (一) 初 创 时 期

女青年会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从美国传入的国际性基督教妇女团体。它的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达，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建立于 1899 年，第一位干事是美国人贝宁格 (M. Berninger)。1903 年她到上海后，就开始注意做女工工作。她在 1904 年秋天举行第一次集会，有 32 名女工参加，会后进行家庭访问。年底开设以教识字办法进行传教的夜校，开始时参加者比较踊跃，后因女工对此兴趣不大，上学人数逐渐减少。1907 年贝宁格回国，这项工作也就停顿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纺织工业和轻工业有较大发展，产业工人猛增，纱厂、丝厂、卷烟厂等大量雇用女工、童工。女工、童工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都很恶劣，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有鉴于此，于 1921 年恢复劳工工作，以社会舆论工作为主，引起社会上对女工的同情，争取改善女工状况。1923 年，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举办劳工事业，各教会大学社会系开设了劳工问题、劳工福利等课程。同年 6 月，在女青年会推动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

了童工委员会，宋美龄任该委员会主席，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韩励生(A. Harrison)和程婉珍都是委员，她们采用演讲和在女青年协会机关刊物《女青年报》以及《字林西报》发表文章等办法，向中外人士及工商界宣传童工委员会保护童工的提案，希望借重工部局力量，通过保护童工的提案。但提案始终未能在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通过。事实证明，依靠女青年会舆论促使在租界上制定保护女工、童工的立法是行不通的。

1925年五卅惨案后，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以工人教育为主。首先做少数女工工头的工作，如为南洋烟草公司女工头设英文班等。随着平民教育的发展，1926年12月，上海女青年会在丝厂林立的闸北设立劳工服务处，办了两个女工平民教育班；设立施诊所，为女工种牛痘及宣传卫生知识；提倡和开展健康的娱乐。劳工部干事龚佩珍、邢德(E. Hinder)和协会劳工部干事夏秀兰(L. K. Hoass)，为了与女工接近，都住进劳工服务处。至1928年春，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已办有平民学校4处，除闸北外，其它3处分设在浦东青年会浦东新村（与青年会合作）、杨树浦沪江大学沪东公社（与沪江大学合作）和虹口启英女中，学生共约200人，大多是烟厂、纱厂、丝厂女工。课程有平民千字课、生活常识等。

1928年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派邓裕志到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做习职干事，负责浦东的平民学校。学校以课堂教育为主，课外活动除游戏外，增加了讲时事、唱歌、演戏、春游等。上课和活动都借用青年会浦东新村子弟学校的一间课堂，以后因附近烟厂女工来读书的日益增多，又在浦东新村租了一处房子，供教师办公、住宿和同学开会之用。浦东的平民学校成了女工活动的中心，是女

青年会第一所女工夜校的雏型。

## (二) 蓬勃发展的三十年代

1929年,浦东、杨树浦和虹口的平民学校不断发展,共有学生160余人。学生已不满足于仅仅学完《千字课》,学校对从识字班毕业的学生教授卫生、算术、尺牍等课。课外活动也逐渐丰富,每周集会一次,有唱歌、演戏、讨论和演讲等活动,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及经济制度等等。有时还外出旅行、野餐,节日还有同乐会。浦东平民学校添置了许多课外读物,供同学们阅读参考,由同学们自己管理。杨树浦平民学校成立了课外活动组织——工人团,由沪江大学社会系同学担任辅导。这时,女青年会平民学校改称女青年会平民夜校。到1930年,正式定名为女青年会女工夜校。

1929年底,社会上劳资纠纷日增,全国协会劳工部派干事毛韵琴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共同筹划,在纱厂、丝厂集中的沪西建立一个完全由女青年会自办的劳工服务处,目的是了解女工状况,“用教育和他种方法应付工人需要,并训练社会服务人才。”(《女青年报》第9卷第5期第107页)后在小沙渡路三和里租了两幢新造的弄堂房子(今西康路910弄21—23号),举办沪西女工社,作为全国各地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示范点。楼下是女工夜校课堂和课外活动场所,楼上是劳工部干事和教师宿舍。为了便于接触和了解工人,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钟韵琴和白美丽(M. Bagwell)一开始就迁入居住,1931年下半年协会劳工部干事夏秀兰和邓裕志也先后迁入。以后,协会学生部干事耿丽淑(T. Gerlach)、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张淑义都曾在三和里住过。青年会全国协会

学生部干事曹亮经常到三和里和干事们谈论国际国内时事形势，对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深入工人大众，增强对工人教育事业的信念，有很大帮助。

邓裕志和钟韵琴经常参加教员会，与教员一起研究教学中的问题，也经常参加工民团（课外活动组织）的职员会，和女工同学促膝谈心，访问她们的家庭。女工同学每天要在厂里劳动 10 几个小时，生活艰苦，到夜校读书很不容易。为了稳定她们的学习情绪，使她们能坚持学下去，劳工部尽力从各方面关心她们的生活。沪西女工社设有医务室，请王淑贞、邝翠娥医生定期来为女工同学检查身体和看病，介绍女工同学到红十字医院、仁济医院、同仁医院等处免费治疗。对有婚姻问题或家庭不睦的，帮助调解，或求助于史良等律师。对失业的女工同学，除帮助介绍工作，并设有一笔专款予以临时接济外，还为她们建立“个案卡片”，把她们的健康、生活、家庭、工作等情况都记在卡片上，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帮助解决。

1932 年一二八以后，上海有大批工人失业，上海女青年会和上海失业救济会等团体，依靠沪西女工社工民团团员的协助，将 500 余名工人介绍入厂。这件事产生了很大影响，使许多女工感到还是读书的好，她们成群结队到三和里来报名入学。1933 年到 1934 年，孙凤琴、胡瑞英、李淑英等女工同学因参加进步活动而受到国民党政府追捕，也曾住到三和里躲避。

劳工部经常邀请对劳工问题有兴趣的国际人士前来参观。美国友人斯特朗（A. L. Strong）、史沫特莱（A. Smedley）、斯诺（E. Snow）以及《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主编葛贵思夫人（Mrs. G. Grenich）等，曾到三和里参观过，并将女工同学的有关情

况向国外报道。一次参观时,正值女工同学讨论时事,提出“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是个小国尚能抵御意大利的侵略,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2年下半年,史沫特莱还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夜校向女工同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的情况。

鉴于女工要求入学的愈来愈多,1931年,上海女青年会在沪西劳勃生路裕庆里13号(今长寿路171弄13号)增办一所夜校,楼上办了一个可供10人住宿的女工宿舍,请了一位工友看管学校兼为住宿者烧饭,住宿的女工同学多数家在农村,她们只需交少量房钱,下工之后可集中精力学习。1933年和1934年,又分别在曹家渡和菜市路(今顺昌路)增办夜校一所。这样,全市已有6所女工夜校,分布在各个工厂区,学生共有600余人。女工夜校学制2年,分初级、高级2个班级。初级班教《千字课》,要求能识字写字。高级班有历史、算术、尺牍等课程,教材采用商务印书馆和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出版的民众教育课本,毕业时相当于小学程度。1933年增设了特级班。为解决特级班教材问题,协会劳工部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沪江大学沪东公社、基督教协进会合作组织工人教育设计委员会,请青年会曹亮和沪江大学教授钱振亚等编辑出版一套包括《经济学》、《经济史》、《工会运动概况》、《一个女工和一个女大学生的通信》、《怎样读报》等女工教育辅导读物。这套读物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生动,切合实际,深受女工同学喜爱。由于初级班和高级班学生程度参差不齐,1934年,劳工部决定在各校增设中级班。学制由2年改为3年。

每所女工夜校聘请教师三四名,她们有的来自“小教联”,有的来自陶行知办的山海工学团,有的是从中学出来的,也有少数大学

毕业生,多数是从特级班培养出来的小先生,充当初级班教师。教师都是进步青年,她们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为了搞好教学,经常深入到女工同学家庭及工厂车间,在与女工同学接触中,自己也不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干事和教师有固定的会议制度,研究如何改进教学,每一二年集中一段时间组织教师进修,讨论教材和教学方法等,还组织她们到无锡参观民众教育试验区,以提高教学水平。

陶行知一贯重视和关心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工作。1933年,在第一次有女工代表参加的女青年会第三次全国大会上,陶先生做了《农工教育对社会改造的重要》的演讲。他有一句名言:“女工夜校就是给女工一把钥匙,让她们自己去开门。”他不但经常为女工同学讲时事,也常在夜校教员会上阐述他的教育思想,支持鼓励女工夜校推行小先生制。浦东夜校徐明清老师是陶行知的学生、山海工学团所属晨耕工学团的负责人,她首先将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推行到女工夜校。她教育同学不要把知识私有,自己学会了就教别人。她从高级班中挑选优秀的同学担任初级班教师。徐明清辅导女工同学、英美烟草公司第三工厂朱冰如等在该厂办女工中午读书班,后来发展到有180多个学生,借了附近一个小学课堂上课。陶行知高度评价了这件事,不仅送去教材文具,还每周亲自去讲时事,教唱《锄头歌》。以后,虹口兆丰路(今高阳路)、杨树浦、小沙渡路三和里等夜校的小先生都办起识字班。至1935年,女工同学办的识字班已达十四五处,上学女工400余人,小先生20余人(都是义务任教),每天上课1小时,教材是陶行知编的《初级市民国语读本》。有关识字班的工作,上海女青年会设立了一个识字运动服务团,由劳工部干事吴元淑等5人担任辅导。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战爆发。

这个时期,女工夜校的课外活动也非常活跃,已有了工友团的组织(有的夜校叫工民团,1937年统一改为友光团)。工友团的宗旨是锻炼女工同学在实践中学习,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团的职员由选举产生,劳工部干事、教师担任辅导。结合当时形势和女工同学的切身问题,采取唱歌、演剧、讨论、演讲、辩论、参观、出壁报等多种方式进行活动。1931年九一八以后,女工夜校更加重视时事教育,经常请陶行知、金仲华、章乃器、王汝祺等前来演讲。一二八以后,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到在龙华举行的工友团夏令营讲“士兵生活”。女工同学还讨论“妇女应否回到家庭中去?”工友团有研究会的组织,讨论“帝国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是法西斯蒂”、“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问题。每逢三八、五一、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各校工友团都举行纪念活动,提出“做工不忘救国”的口号,号召团员“爱用国货,抵制日货”,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夜景》、《谁是朋友》、《热风》、《旱灾》、《一天十二点钟》等节目,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浦东夜校团员和劳勃生路夜校团员还到农村演出,吸引农民成群结队前来观看。工友团团员经常在各种集会上演唱进步歌曲。劳工部干事和同学曾根据工人打夯唱的曲调编了《工友们团结》的歌。劳工部还编过一本《大家唱》歌本。有的团员学唱《劳工神圣》之后,懂得了靠自己劳动是光荣的,丢掉了自卑心。她们有时也集体去看《十字街头》、《摩登时代》等进步电影。还曾去慰问被日本驱逐回国的同胞。

许多女工同学还是工人运动中的活动分子。1935年,美亚织绸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浦东夜校和劳勃生路夜校同学都曾为此进行募捐,或将义演所得支援罢工工人。福新烟厂罢工时,三

和里夜校同学在厂墙外搭起人梯，将募得的大饼、馒头、面包等送到罢工工人手里，自己却挨到木棍打、水龙浇。在南洋烟草公司工厂、大东烟厂、华盛烟厂、柴阳袜厂的罢工中，夜校同学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同学还因此被工厂开除。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将侵略势力伸向整个华北。12月9日，北平学生为了救亡图存，举行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宣告成立，协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和编辑部干事陈维姜都是妇女救国会发起人，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谢祖仪也是成立大会主持人之一。成立大会在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女工夜校许多师生参加了大会和示威游行，她们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标语，高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走在队伍的前头。游行队伍虽然在四川路桥遭到手持大刀和水龙的租界帝国主义军警的阻拦，仍然奋勇地冲过桥，胜利回到青年会后解散。1936年，在上海妇女救国会纪念三八、五卅、九一八的示威游行中，女工夜校师生不畏警棍挥舞、囚车紧跟，成为群众队伍中一支坚强力量。在纪念九一八的游行中，林琼老师和孙凤琴、李亚芬等同学都被打伤。以后在为鲁迅送葬、支援绥远抗战、抗议迫害“七君子”的行列中，女工同学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积极参加。

1936年2月，陶行知发起成立教育界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邓裕志和徐明清等教师都是国难教育社成员。女工夜校教师及一部分同学常去参加国难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听邹韬奋等演讲抗日救亡问题。在课堂上，教师向同学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陶行知、金仲华、章乃器、罗叔章、邓初民、杨东尊、宦乡、沈体兰、吴耀宗等经常来为女工同学讲国际国内时事形势，孟波、麦新、



郁应恺等来校指导歌咏活动，姚时晓等指导演剧活动。教唱的歌曲和演出的戏剧，都结合时事形势及女工生活。在孟波、麦新的辅导下，女工同学集体创作了一首《工人自叹》歌曲，流传很广，是当时大家最喜爱的一首歌。女工同学还经常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女青年会会所大厅举行歌咏大会，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曾引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注意，遭到警告。30年代，上海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曾到女工夜校指导活动，如指导过歌咏的还有冼星海、吕骥、田蔚、刘良模等，指导过戏剧活动的还有陈波儿、郁凤、万籛天、王为一、徐韬、崔嵬、陈荒煤、周钢鸣等。

1936年11月，沪东、沪西日商纱厂4万余工人的大罢工，对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大罢工首先发动于浦东。杨树浦女工夜校同学、日商上海纱厂工人刘贞，当时年仅17岁，参加了这次反日大罢工的组织发动工作。杨树浦夜校许多同学都积极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到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向工人家属做解说和救济工作，联络其它纱厂工人支持大罢工，并通过其它女工夜校串联，以扩大罢工范围。其它女工夜校师生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罢工，如教师丁宁等曾往胡子婴家里收集米票。劳工部干事张淑义在女青年会董事、委员中募得捐款、粮食、物资等，由夜校同学分送给罢工工人或其家属，以维持罢工期间的生活。

1937年上半年，女工夜校学生已达800余人。7月，在上海盲童学校举行友光团夏令营，有各校友光团代表四五十人参加。夏令营以民族存亡问题为中心内容，请王任叔、陶行知、季洪、史亚璋等讲日本侵华野心、国内时局分析等，还请东北抗日义勇军演讲。开展了“如果战争在全国爆发，我们应该做什么？”的讨论。还请护士讲授救护知识，为抗战作必要的准备。夏令营尚未结束，7月7日

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夏令营结束后，友光团代表们都回到夜校动员同学，一旦战火蔓延上海，大家都要奋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 （三）抗战八年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劳工部工作完全转入全民抗战中去，动员女工同学参加各界救亡组织办的难民收容所，担任宣传、卫生、扫盲和管理的工作，有的到伤兵医院担任护理。女青年会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办了一所可收容200多名妇女儿童、儿童的妇孺难民收容所。难民大多数是从郊外逃来的，组织她们做花边、做布鞋等，并办了一个幼儿园，解决带孩子妇女的困难。女工夜校的大部分教师和同学都积极投入工作。11月，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日本军队逐步推进，距枫林桥中山医院已经不远，这时还有一部分女工同学和伤员尚未撤出。劳工部干事钟韵琴当即设法弄到一部卡车，连夜将同学和伤员接出，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中山医院。国民党军队西撤时，全国妇女抗敌慰劳总会何香凝派人与劳工部联系，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女工夜校同学报名非常踊跃，但是名额有限。战地服务团成立时，人员共11人，有任秀棠、胡瑞英、秦秋谷、李亚芬、柳秀娟、张定宝、郑惠珍、李惠英、金敏玉、龚琦玮和慰劳分会派来担任团长的胡兰畦，因其中9人是女工，故取名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服务团起先被派到淞沪前线18军罗卓英部，发放慰劳物资、救护伤员、宣传鼓动等，工作做得很出色，深受群众和士兵们的欢迎，被誉为“战地上的一朵红花”。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批。大多数团员以后参加

了新四军或奔赴延安。小姚老师、李亚芬、季月娥、冯玲宝、蔡月梅、徐佩珍等同学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劳勃生路夜校教师陈维清、金伟君、顾瑞英和不少同学，利用“孤岛”特殊环境，组织女工同学开展抗日活动，曾引起租界当局注意（扬言要搜查夜校）。钟韵琴得知后，立即赶来告诉大家，经研究决定，学校迁到小沙渡路三和里，转移进步书刊和传单，并帮助住在校内女工宿舍的同学找到新住所，把剩余的米分给她们，安排好她们的生活。

1938年夏，上海租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难民工作接近结束。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张淑义、梁思懿和教师们一起着手筹备恢复女工夜校。到8月，已有小沙渡路三和里、麦根路（今康定东路）和菜市路3所夜校开学。寒假时在七浦路增设1所，不久又在曹家渡增设1所。5所学校共有女工学生600余人，教材是《平民千字课》，教师在讲课时机动地结合进步内容。有些女工同学还自学《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小册子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劳工部曾和工部局教育处合办过一期业余教育进修班，课程有业务专题及时事政治，讲课的有俞庆棠、吴亮平、王任叔等，夜校教师全体参加。

这时，友光团活动也恢复了，沈体兰常来讲时事，郁凤、丁当、徐韬等来教唱歌、指导演剧。友光团团员唱起《打东洋》、《募寒衣》等新歌曲，学会后再教给车间小姐妹。上海各界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时，团员们节衣缩食，踊跃捐助，有的甚至把早晨泡热水洗脸的半个铜板也省下捐献。这样积少成多，后来整笔捐款经过许广平送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团员们也为新四军捐过一笔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女青

年会工作上和经济上都发生了很大困难，女工夜校紧缩到最后只剩三和里一所，除了上课以外，一切活动都属非法。在艰难恐怖的日子里，频繁的戒严、封锁、灯火管制、断电……，但仍有不少女工冒着危险来校读书。钱琴、黄纫秋等4位教师抱着全力以赴克服困难的决心，点着油灯给学生上课，用编结毛衣的收入补充菲薄工资的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坚持将夜校办下去。她们还深入工人的宿舍和家庭，了解工人的思想和生活，帮助女工治病，为失业女工找到职业。沪西平民产科医院沈骥英医生始终坚持每周一个晚上到三和里为女工看病、检查体格，有时还为女工同学上课，讲授卫生知识和女工常见病——肺病、妇科病的防治等。海防路光华眼科医院院长张锡祺长期免费为女工夜校同学治疗眼病。

1945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苏商《时代日报》成为女工夜校同学关心时局的最好的读物。她们还利用厂休结伴到苏侨俱乐部和杜美大戏院（今东湖电影院）观看《保卫斯大林格勒》、《女壮士》等反法西斯影片。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女工夜校学生和全市人民一样莫不欢欣鼓舞。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由于来不及到上海接收，让汉奸周佛海、汪伪军继续留在上海“维持治安”。抗战胜利给上海工人带来的却是关厂、停工、失业，工人们异常愤懑，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护厂，不准日本侵略者往厂外运东西，要求厂方解决生活问题。女工夜校学生表现得很勇敢。如三和里夜校学生、内外棉第二加工厂（今上海市第一印染厂）女工杨善，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看见厂门口仍是日本兵站岗，不让工人们进厂，她走上前一把抓住日本兵手中上着刺刀的枪，带领一群工人冲进厂里，找日本大班谈判。

#### (四) 抗战胜利后的女工夜校

随着抗战的胜利，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协会劳工部拨了一笔经费给上海女青年会，顶下了曹家渡白利南路(今长宁支路)仁和里和杨树浦榆林路晋成里两处房屋为第二、第五女工夜校校舍。上海女青年会又先后租借了杨树浦、南市等小学校舍办第三、四、六女工夜校。到1946年，恢复女工夜校6所，学生增至1000余人。

指导劳工部工作的上海女青年会劳工工作委员会，抗战期间一度停顿，此时也恢复了，委员有汤凤美(王心康夫人)、胡绣枫(李剑华夫人)、金江蕻(沈体兰夫人)、沈骥英、胡耐秋、钟复光、杨向时、戚逸影等。还聘请过女工同学代表王菊秀和杨杏轩为委员。雷洁琼和俞庆棠担任过女青年会董事，她们也很关心和支持劳工部工作。

协会劳工部为了加强对各地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指导，1946年秋，与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合作，在曹家渡第二女工夜校所在地举办劳工福利工作实验站，聘请邵瀚容为执行干事。实验项目有编写女工教材、培训女工歌咏和戏剧人才、组织校友读书会、出版《友光通讯》和友光团活动资料，还有图书室、卫生室等文化福利设施，不仅为第二女工夜校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而且对其它几所夜校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也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教材是女工夜校教学中的重要工具，过去编的一套教材有的在战乱中失散，有的随着形势变化已不完全适用。1946年，协会劳工部专门聘请黄静汶负责编写教材工作，并由俞庆棠、方与严、胡

绣枫、傅彬然、胡耐秋、王辛南等组成教材编委会。教科书定名为《女工读本》，共6册，供3年制女工夜校使用，要求学生从识字开始，由浅入深，在3年内达到相当于小学毕业或稍高一些的文化程度。课文内容包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注意联系工人实际，引导工人前进。1948年秋，《女工读本》由协会正式印发各地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使用，深受女工学生欢迎。

教师队伍也扩大了，这时期先后有四五十人。教师的共同点是年轻、热情、正义感强、素质好，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了密切联系女工群众、艰苦踏实为劳工教育事业服务的好作风。她们在教员会上经常研究教学中的问题，探讨如何联系实际讲好课，并利用暑期进行短期进修活动，如1947年夏季举办的教师夏令进修会，沈体兰、胡绣枫以及协会邓裕志、耿丽淑、高君哲、高仁瑛等都来讲过课。1948年夏，在协会劳工部指导下，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与南京女青年会民教部合办教员训练班，对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辅导课外活动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友光团在抗战胜利后又活跃起来了。针对女工学生喜欢唱歌、演戏的特点，请陈良、茹伟、杨今豪等担任歌咏老师，请育才学校强明、钱风、章恒指导跳舞、演戏。各校友光团一般每隔两周或一个月有一次文艺演出，每逢纪念三八、五一和毕业典礼大会，则举行规模较大的演出。演出内容大多是师生集体创作，如《失业》、《花棉袄》、《更生嫂》等，反映工农大众苦难生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表现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和斗争决心。不少女工就是从看演出开始，对夜校发生兴趣，进夜校读书的。1947年三八节，友光团活动以“妇女与社会”为主题，展开妇女问题的讨论，并从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苏联领事馆借到各国妇女生活的图片和电影，到各校

展出、放映。劳工部在女青年会江宁路会所办了一个妇女生活和成绩展览会，用图表、照片和实物反映女工对社会所做贡献极大，其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情况却很差，使许多人，尤其是没有接触过工人的学生部、少女部会员，看后深受教育。

女工夜校很多同学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们的进步和当时整个形势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日本纱厂迟迟不开工，不少私营厂亦因美货充斥市场而停工减产，全市仅纺织业失业工人就达 20 万。女工夜校同学大多数在纺织、轻工等厂工作，形势迫使她们必须投入要求复工、要求失业救济的斗争中去。组织起来的沪西失业工人，其中不少骨干如汤桂芬、杨美龄、杨善、何彩东、张菊宝、郭培燕、陈素英、张金娣、蔡金媛等，都是女工夜校的同学。1946 年三八节，全市三万妇女在上海妇女联谊会领导下，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和示威游行，号召全市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纪念活动中的女工发动工作主要由女工夜校同学负责，代表女工在大会发言的国棉二厂女工张金娣也是夜校同学。1946 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广大人民从严酷的现实中逐步认清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须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上海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女工夜校经常请许广平、胡子婴、罗叔章、雷洁琼、俞庆棠、孙起孟、张锡昌、漆琪生等来夜校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做各种专题演讲。一贯关心、支持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陶行知先生，于 1946 年 7 月 7 日（他去世前 18 天）在女工夜校毕业典礼大会上讲话，并作了一首《赠女工夜校毕业典礼》诗，表达对女工夜校同学的期望。

当时发生一连串震动全市的重大事件，如三轮车工人喊大咬

子被美军打死、摊贩请愿被镇压、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国民党特务打死以及美军强奸女学生等，教师们及时向同学揭露事实真相，同学们听了无不义愤填膺，回到工厂向工人们揭露美帝、国民党反动派暴行，并以写信和募捐等方式慰问死难烈士家属。工厂罢工时，女工同学常常把在夜校里学到的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光明之路》等，教给大家，并指挥歌唱，鼓舞工人們的斗志。

国民党当局很注意女工夜校的活动，市长吴国桢、教育局长李熙谋经常向上海女青年会董事俞庆棠和总干事陈善祥提出警告。警察局、社会局、教育局不断找夜校负责人王知津等查询师生情况，并派人来校“视察”。他们用种种卑劣手法阻挠和破坏女工夜校工作，对到夜校读书的工人进行造谣中伤，查抄女工学生的书包；串通资本家晚上提前关厂门，使工人们放学后不能回工房睡觉；派流氓在女工夜校门口捣乱，监视教师，盯梢侮辱女工学生，企图使她们不敢上夜校，等等。但女工夜校的师生没有被吓倒。1947年3月5日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麦根路第六女工夜校，抓走教师张莲华，同学们气愤极了，向报馆写信，强烈要求“还我张先生”。为了营救张莲华，女青年会董事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张莲华关在什么地方。市长吴国桢却否认抓人。邓裕志、耿丽淑、陈善祥等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在中外报纸上呼吁保障人权，要求调查包括张莲华在内的一系列“失踪”事件。在各方面压力下，张莲华被释放了，但常有特务盯她梢，使她无法在上海待下去，在沈体兰的帮助下去了香港。张临走时写了一篇《我控诉》，交给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后来在《密勒士评论报》、《文汇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揭露了她被捕的经过，并把她



在狱中遇到的其他被捕人员的姓名以及特务对待他们的卑劣手段和法西斯暴行公之于众，用铁的事实戳穿了当局否认捕人的无耻谎言。

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以假和平为烟幕，开始作逃跑准备，下令将上海重要工厂迁至台湾和华南等地。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反动派来不及迁厂，派遣军队到各厂驻扎设防，企图镇压工人，破坏工厂。这时，夜校同学都回到工厂，同工人们一起，参加全市人民反迁移、反破坏和护厂、护校的斗争，维持社会秩序，终于在5月27日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20余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推动着她不断前进的历程。解放以后，女工夜校许多同学分散在政府机关、工会、妇联和工厂工作，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